

<<感时忧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感时忧世>>

13位ISBN编号：9787549507962

10位ISBN编号：7549507961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资中筠

页数：2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感时忧世>>

前言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

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

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

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

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

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

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

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

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

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

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

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

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

这本非我所愿。

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

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

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

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

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

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

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

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

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

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

《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

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

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

<<感时忧世>>

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

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

“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

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

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

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

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

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

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

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

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

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

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

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

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

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

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

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

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

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

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

《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

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

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

<<感时忧世>>

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

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

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

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

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

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

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

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

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

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

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

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

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

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

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内”竟比“圈外”更明显。

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

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

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

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

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

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

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

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

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

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

<<感时忧世>>

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

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

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

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

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

》、《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

》，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

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

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

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

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

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

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

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感时忧世>>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内容涉及中国发展道路、新闻媒体自由、公民教育、高等教育科研、文化建设方向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作者直接针对社会生活情况展开讨论，最大的特点是，从深层次的历史、思想观念、文化心理诸因素展开分析，结合理论谈现实，或挖掘历史渊源，或作中外对比。

<<感时忧世>>

作者简介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

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20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译著：《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等。

<<感时忧世>>

书籍目录

也谈“中国模式”

岁末杂感致友人

断想数则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千条万条，反腐败是第一条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叫停“形象工程”此其时矣！

可否慢一点奏凯歌？

我的困惑

灾后感言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问题关键在哪里？

——也谈收容制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优生还是怪胎？

“小骂大帮忙”新解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非典”与“五四”精神

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

为实现“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而努力——作为受众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企盼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

我们的“文化”怎么啦？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公民

大学“评估”之弊

中国人还是应学好中文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

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及中国国情

人格与国格孰先？

一定要“团圆”到皇帝身边吗？

男子中心社会的“语境”

跨世纪中国人将何以自处？

有感于冯友兰先生的“反刍”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

<<感时忧世>>

章节摘录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刊载关于“三反”运动的文章，结尾称该运动“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实在难以苟同。

诚然，由于对当代史真相的屏蔽，一般民众只知当年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被毛主席下令枪毙，感到无比痛快。

由于法治不健全，中国老百姓仍未摆脱期盼“青天老爷”或“明君”为民除害的传统心理，出于对今日贪腐之痛恨，把那场运动理想化，也不足为怪。

但是那篇文章前半部明明披露了许多“扩大化”的情节（当然远不足以反映其严重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不解。

这里面的逻辑说明长年政治运动熏陶下的思维定式影响深远。

其一，只问结果，不问程序。

如果说，最后“树立正气……树立共产党的威望”的结果值得肯定，那么在这过程中无数受冤屈、受伤害、人格被侮辱、精神受戕害、家破人亡，乃至自杀的人呢？

最后“落实政策”，受罚、判刑的人数之如此“少”（姑不论其中尚有多少冤案），更说明原来蒙冤人数之多，他们所受的有形、无形的损失，以及直接、间接受其牵连的受害者，是无法统计，也无法弥补的，更不用说已经“迫害致死”的生命。

为了“除恶”，必须以如此广大的善良人们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吗？

而且，这种损失是从来得不到赔偿的。

其二，“有罪推定论”。

先把广大无辜者当作犯罪嫌疑人，“沙里淘金”地找真犯，实际上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翻版。

对于这点，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曾做出决定不再搞“运动”。

不过实际上变相的大小“运动”又搞了几次，说明这种“传统”积习难改。

其三，以“运动”治国代替法治。

那么多人，只因其工作涉及钱物，就被当作潜在的贪污犯，无端被剥夺人身自由，“审查”批斗的手段完全是逼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在新政权建立伊始，就开了蔑视法律、任意侵犯人权的恶劣先例。

以后历次“运动”都依此办理，施之于思想领域，就更加没有明确的边界，打击面一次比一次大，直到“文革”达于顶峰。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是就其“天下大乱”的规模和残酷、荒谬的程度而言，事实上在治国理念、思维模式上是有例可循的。

其四，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法无天，而所有执行者都无法有“天”，这“天”就是一个人在某时某刻的一句话。

“三反”前期的大打“老虎”是因一个人的几句话，并下令限期做出“打虎预算”；刘、张是否罪当死，亦无法律依据，只因“树典型”需要，就成钦定要犯，各地照此办理，“死罪”只凭第一把手意志决定；后期同一个人又说要“实事求是”，批评“主观主义”，把造成如此大面积伤害的责任推给下面执行者的“主观主义”。

这种驭下、驭民，收放自如之术，贯穿在历次政治运动之中。

那使几十万大小知识分子上当的“阳谋”自不待言。

接下来的“大跃进”，以一人的师心自用，造成饿殍遍野，又以彭德怀的冤案钳众人之口，忽然转而批评下面虚报、浮夸，下令“实事求是”。

一人上下其手，永远英明正确，而在这过程中造成多少冤案、冤魂，在所不计。

其五，所谓树立“正气”，值得怀疑。

<<感时忧世>>

从本质上讲，在全民范围内进行逼供，不是整人就是被整，鼓励互相揭发，造成杯弓蛇影互不信任，“正气”何在？

事实上，正是从“三反”开始的（在此前的“镇反”已经开始，不过规模较小）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造成了一种“揭批”文化，把一时的“政治”任务置于一切人伦、道德之上，或被迫，或自愿告密成风，至亲人反目，友情疏离。

中国传统士大夫重名节，“士可杀，不可辱”，在“三反”中无端被诬为贪污是最大的人格侮辱。所以王世襄老先生对各种人生坎坷、政治帽子都能泰然处之，唯独对于当年被诬陷贪污故宫文物这一点，至死耿耿于怀，一定要讨一个明确说法。

自“三反”以降，历次“运动”中莫不对批斗对象采取人格侮辱的做法，使人人以最坏的设想加于他人，也加于自己。

于是，善恶是非都被模糊、颠倒，似乎天下无“好人”，随便什么人，干什么坏事都是可以想象的。运动一来，高压之下，说假话成风，何来“正气”？

“三反”运动实开其先河（这里只谈1949年之后，在此以前的，如延安“抢救运动”等，姑且不论），只是时间比较早，范围尚不如以后的“反右”那样大，但本质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其六，“三反”与“五反”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是重点，其对象是广大民族工商业者。

就被打击的对象而言，“五反”与“三反”一样先扩大，后收缩，最后“落实政策”。

但是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各阶层各党派代表共同制定的“共同纲领”不到两年，转身即遭废弃。

从此时起，完全背离“新民主主义”道路，而企图跳跃进入“社会主义”。

刚开始恢复元气的大小民族工商业遭到当头一棒，逐步被取消或收归国有。

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几十年不断向“左”的建设弯路从此开始。

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在运动一开始就自杀，主要不是因为个人受迫害，而是敏锐地意识到前途绝望，颇具象征意义。

P20-23

<<感时忧世>>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和资中筠是三十多年的至交，有通家之好。她学贯古今中外，胸怀天下黎民，勤奋好学，与时俱进，笔耕不辍，思想常新，很值得我们学习。她对属于正业的国际问题研究，造诣很深，特别在美国某些专题的研究和中美关系上，有不少突破。近些年来，她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扩大了境界，更加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写了大量针砭时弊、捍卫正义的文章，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诸多名人激赏，在社会上和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借自选集出版首发之际，衷心祝愿资中筠健康长寿，继续言说。这将是读者之福，中国学术思想之福。

“——何方 资中筠先生是总让我产生自卑的长辈之一。在她面前，我从来都有一种惶恐如影随形；有一种做错了什么和什么做得不够彻底的感觉始终笼罩着我。

她的学识，她的人格，常常像镜子照出我的一些丑态来。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的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和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

——阎连科 一句“学而优则仕”，一个科举制度，把读书人赶上“做官”的单行道，一赶就是两千多年。

读书人希望“致君尧舜”，君主们则得意于“入吾彀中”。

结果，一旦为臣，从此失去了话语权，想说什么，都得看上头的颜色。

强项者多半掉了脑袋。

“臣”，其造字的本原意思，就是绳索牵着的奴才。

社会进入“现代”，必须有一批独立的自由思想者，其责任不在迎合上意，而在批判现实，构想未来。

资中筠先生是其中一员。

当为政者开始懂得独立思想者的重要并学会从他们的思想创造中汲取理念时，中国才有可能走出“中世纪”。

——陈四益 “每回我读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听她的发言，总是十分惊讶她如何从一堆乱麻中，一堆似是而非的说法中，迅速找出事情的本质，切中要害。

她举重若轻的文字，引导着我们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的基本方向。

——崔卫平 “资中筠先生是我的清华学长，也是我参与编辑《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和主要作者。

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

她的风骨一直为我景仰。

资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深刻，文笔清新典雅。

听先生的演讲，读先生的文章，或醍醐灌顶，或如沐春风。

她对世界和国事的洞察，常给我以启迪。

先生的著作集结出版，是对我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杨继绳 祝贺资中筠自选集的出版！

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

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

<<感时忧世>>

她对“独立”的珍爱，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

——余世存

<<感时忧世>>

编辑推荐

《资中筠自选集：感时忧世》是资先生第一次具有总结性的全面性的作品的结集出版；本书是资先生在学术研究之外，关注国计、民生等诸多现实问题，“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的忧思录；这些年来资先生有影响的文章都汇集了，比如《岁末杂感致友人》《我的困惑》等。

<<感时忧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